

# 新旗

第六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 如此和會！

蘭因

這幾天二十國代表廣聚法國首都，開和平會議，很容易使人想起二十七年前另一個和會，那時也是在法國首都開的，不過不是在城內的盧森堡宮，而是在城外的凡爾塞宮罷了。

凡爾塞和會及其簽訂的條約為世詬病，我們至今還在攻擊牠，因為牠是分贖式的會議和條約，不僅未能建立永久的和平，而且播下將來戰爭底種子。果然，二十年之後，牠收獲了當初播種的果實。然而在開會當時，除了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以外，一般輿論并非這般看法。當時戰爭是接受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有名的『十四條』而結束的，人們彷彿覺得從此正義可以代替強權去統治世界。各種被壓迫人類，除了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直接領導的以外，都翹首仰望巴黎，或者派遣代表到巴黎來，爲了向和會訴苦，或爲了向和會上條陳，獻救世方策。我們試想當時中國民衆對於巴黎和會寄託何等濃厚而崇高的希望！那次和會雖是分贖會議，外表上確有令人景仰和希望之處。

此次和會則是赤裸裸地，連那種外表也不要了。牠已經沒有那種理想主義的外衣了，大西洋憲章和四項自由不僅沒有『十四條』來的漂亮，而且未至戰爭結束就已成了破布爛衣，人們簡直懶得再縫一件去披掛牠。當事人和旁觀者，誰也沒有甚麼理想。誰也不信能以此條約去避免戰爭，赤裸裸地祇有強權，沒有公理，赤裸裸地是分贖的會議，是準備未來大戰的會議，是大國操縱一切，小國俯首聽命的會議。試問中國今天還有誰寄託這個和會以對於上次那個和會千分之一希望呢？

路透社七月三十一日巴黎電：『巴黎和會全體

大會今日開會共三小時，至下午七時休會，……今日會議時未及終場，即有諸代表紛紛離場，貴賓席幾全空，當巴西代表發言時，僅記者席內有若干記者點綴。……」當然囉，一個演戲式的會議，戲又演得不精采，誰耐煩看下去呢？

僅僅從開會程式或手續來看，也明顯表出兩個和會之間的差異。上次和會雖是幾個大國操縱的，但形式上大國並沒有甚麼否決權，參加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有起草和約，討論和約和通過和約的權利。和會通過的文件就是正式的文件。此次和會，則不過是一種諮詢會議而已。條約是在開會以前由四大國外長起草好了的，重要問題大多數決定了的，開會時這起草好了的條約拿出來給那些小國代表『討論』，和會本身又沒有通過條約的權利，『討論』結果祇能供大國做參考，最後確定的條約仍是四大國外長另開會議來通過的。上次和會是把一切問題都在一個會議中討論的，雖然分別簽訂條約。此次和會則分做三次開，現在開的是關於對意，匈，

## 第六期目錄

如此和會！.....	蘭因
如何發揮人民的力量？.....	振聲
怎樣抵抗資方反攻？.....	舒嚴
『勝利』一週年.....	唐盛
敬悼陶行知先生.....	三男
論中共的土地政策.....	鳳岡
日本工人鬥爭的新形式——生產管理（日人通信）.....	郭溫源
革命問題漫談（續完）.....	穆德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Jellis

發行者  
通訊處

新旗社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保，羅，芬五國條約的和會；以後又不知再過幾時才要開那關於對德條約的和會；以後又不知再過幾時才要開那關於對日條約的和會。世界革命或第三次大戰，能等待麼？能等待這一切和會通通開完以後才爆發麼？

開會程式或手續問題，并非不重要的問題。人們不能拿理想主義外衣來遮掩分贓式會議，不能將一切條約拿來在一個和會上起草討論和通過，不能像克列蒙梭，路易喬治，威爾遜一般有大國操縱之實而無其形，——這是爲了甚麼呢？爲了現在那些政治家才幹不及古人麼？不是的，這是爲了經過二十七年時間及另一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已經更加成熟了，即更加腐爛了，即階級的和民族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祇容許開現在這種和會，而不容許開以前那種和會了。

但無論現在的和會也好，以前的和會也好，任何形式和內容的和會也好，祇要是由資本主義強國來把持的，都無法建立世界的和平。人類底命運已經同革命，同國際主義，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了。一港一區底分合，賠款數額底規定，艦隊底移交，殖民地底分配，等等，——這些難道能解決問題麼？

根本解決問題的，祇有『歐洲社會主義蘇維埃合衆國』；再進一步，『全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合衆國』；最後廢除了國家本身。

## 如何發揮人民的力量？

振 聲

馬敘倫先生在八月一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專論，提出了一個口號：『人民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這在馬先生及其同一羣人中，確實是一大

進步，一大覺悟。我們自然不是說，馬先生等以前是『糊塗的』，現在明白了，不是的，這裏絲毫沒有個人的智愚問題包含在內。論知識，論學問，馬先生等是高人一等的。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關於政治的態度問題，而政治的態度，尤其是鬥爭的態度，却極大部分決定於一個人的階級立場，很小部分才決定於他的智慧。

馬先生是目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派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論雖然是個人負責的，但能代表一大羣人的見解。所以是值得看重的。

過去，馬先生的態度是一個『忠貞反對派』的態度，換句老話說，就是『忠臣』態度，他是處處期望着『主席』及其政府的，有時候，也相信馬歇爾元帥會給我們帶來民主與和平。這次不同了，馬先生不再希望政府能夠給我們民主與和平，也認爲美國對於中國『不是完全基於道義的』（話還是說得太客氣）。他大聲疾呼地喊出了『人民自己來解決！』的口號。這是好的。至少，他表示出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已經更向左邊進了一步，雖然離革命的態度還遠，但至少要越出『忠貞反對派』的界限了。

其實在我們，事情是早就明白的，『人民自己的問題祇有靠人民自己來解決』，我們沒有對任何國內的既成勢力存過幻想，我們也不對國外的馬歇爾，杜魯門，司徒雷登，甚至當年的羅斯福存過幻想，我們始終覺得：『祇有自己靠自己』。我們所以能有這樣的認識，讓我們再說一遍吧，並非因爲我們比民主派諸先生聰明些，而只是因爲在社會的地位上更低微些，對統治的諸勢力更少淵源些，因而能更少幻想些。我們工人受生活的教訓，受鬥爭的教訓太殘酷了，使得我們除了自己之外簡直不相信任何其他的力量，尤其不相信當權的有產者的政

府能給我們什麼真實利益。

就目前中國的特殊情形說，我們是從來不相信美國，國民黨，甚至共產黨，能給我們以民主與和平的。民主和平必須靠我們人民，具體言之，即必須靠工人，農民，以及全體勞動分子（智力的與體力的）自己的力量來爭取。

馬敘倫先生，在這點上，達到了與我們一樣的見解，這怎能不爲之欣喜呢？

但是問題還有，人民如何能發揮出力量來解決問題：

我們在第四期刊裏提出過主張：立刻由職工會，學生會及各種團體（包括自由職業分子的團體），按照各該組織的人數比例，推舉代表，組織一個統一，集中，超黨派的上海各界爭和平民主的代表會議，由馬來領導我們的鬥爭。

現在我們還是那樣主張，尤其那樣主張；不過爲了容易實現些起見，我們提議：在上述的代表會議尚未產生之前，不妨先由各工會領導，由各單位工人選舉，先成立一個上海工人爭和平民主的代表會議，作爲我們上述那個代表會議的準備與基礎。

## 怎樣抵抗資方反攻？ 舒 嚴

最近的局勢，是反動派各方面都採取攻勢：在鄉村，政府軍隊數處同時向農民性的共產黨軍隊進攻；在城市，民主派領袖被人暗殺，參加民主運動的教員學生被人開除，要求民主的雜誌報紙被人取締；在城市，資本向勞動實行大規模的反攻。內戰是全國注目之中心，一般民主運動被摧殘也激起了不少的抗議，惟獨資本反攻則不很引人注意，——其實後者底重要，即使不超過前二者之上，至少也是同前二者相等的。

最近的勞資鬥爭可以拿慎昌洋行工潮做標本。同勝利以來歷次工潮相反，此次工潮并非由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發生出來的，亦非勞方先發動的，而是資方先向勞方進攻的。美商慎昌洋行機器工廠，戰時曾被日本佔用，有一部分工人是日本管理時代新雇用的，勝利之後美國資本家重來，把工廠收回去了。資方稱那些工人為『僱工人』。上月資方藉口虧本，要求減少工人工資，而且以關廠來脅迫。工人不答應，風潮就鬧大了。照例社會局及其他官方機關出面來調解，上海市長吳國楨甚至自己出馬來調解。

以前的工潮是出於勞方要求增加工資的，現在這次工潮則是出於資方要求減少工資了。

勞方很明白此次資方反攻之意義，即問題不僅關係慎昌一廠工人，而且關係全上海工人。七月三十日聯合晚報說：『據勞方意見，減低工資為絕對不能接受之事，蓋若接受，則全滬各廠均將效尤，慎昌洋行工人決不願為害羣之馬也。開經濟部，資派委員會，中紡公司等亦已有減低工人工資之計劃，現均注目慎昌洋行之發展也。』這話可謂一針見血。換一句話說，這是全體資方有計劃的行動，不過先推一家『美商』發難，添加『外交壓力』於勞資糾紛之中，更容易成功些。一經成功，所有資本家都可效尤了，豈但那些官僚資本而已。

官方調解人當然裝做是中立的，有時還會站在工人方面說話，例如說資方所謂『僱工人』一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淪陷期間工人為了生活在敵僱工廠做工并不可以稱為『僱工人』，但根本上這些調解人完全贊同資方減低工資的要求，勸工人接受這個要求。他們認為『現在祇有二條路來解決此次勞資糾紛：一是關廠，另一是減成發給工資。若關廠，則所有工人都要失業；若減成發給工資，則工人

雖然收入減少一點，畢竟還可以生活，希望勞方加以考慮。』（見七月三十日聯合晚報）關廠顯然是

一種威脅，工人代表說：『他們資方并不預備關廠或裁員，他們的目的是減工資。』（同上）官方如果是在勞資糾紛中守中立的，那為甚麼要加緊壓迫工人呢？電話工會二個會員為了『反美嫌疑』被捕，這是報紙公開登載的。七月三十日文匯報載：『日來，各工廠戒備森嚴，工人時有被逮，工會與有關當局交涉亦無結果。』可見，電話公司之外，被捕的工人還有好多，報紙都不登載。報紙上看不見的。還有官方委派外人來代替羣眾選出的工會理事，組織『護工廠』，以武裝監視工人行動，種種事實。最近簡直公然以『煽動罷工』罪名逮捕工人了。他方面，官方又召集會議，修改勞工法，會場中有人提議官辦事業工人不許罷工。法律上明白取締工人罷工權，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工人還不是為了更進一步提高自己地位而鬥爭哩，而是為了保持過去勝利品而鬥爭。將近一年來工人鬥爭所得的勝利品可分為：（一）依照生活指數計算工資，（二）工人自選工會理事，（三）罷工權得到事實的承認，等三項。現在這三項勝利品都在風雨飄搖之中了。

要保衛既得的勝利品，不可一味退守，應當攻守兼施，不可將鬥爭嚴格限制於經濟範圍，應當擴展到政治上去，又不可嚴格的以民主鬥爭為限，必要時也應當提出過渡性的，即從民主走向社會主義去的要求。

例如現在資本家要求減低工人工資時，最有力的武器不是關廠麼？美商工廠已經要關廠了，中國工廠更有理由提出關廠來脅迫工人。此時工人如果退守，則非答應減低工資不可。工人應當勇敢採取攻勢，應當告訴資本家說：『你們既然關廠不開不下

去，那麼讓我們工人自己來開工，來管理工廠罷，我們把生產品賣出去，從中支領了工資之後還能繼續擴展生產。』日本工人就是用這手段對付資方關廠威脅的。日本已有二十八家產業實行工人管理了。有一家產業經過工人管理之後，工資竟增加了三倍。戰敗國的日本工人已進步到這個程度了，何況我們是戰勝國？

## 『勝利』一週年

唐威

去年今日（八月十五日）日本皇帝裕仁廣播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從此結束了中日之間的戰爭以及全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事至今剛滿一個週年。

這一年來民衆情緒底變化是極可驚人的。日本投降消息初傳播時，大家都認為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了，人們由衷相信美國對我們毫無野心，將盡其可能幫助我們建國，而領導抗戰的國民黨也將能領導建國以至完成，共產黨亦將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向着和平民主大道前進。現在才過一年，這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了。無論是誰，想起了去年今日，都如做夢一般。在這勝利的第一週年日子，誰也提不起慶祝興趣。

惟有我們這一羣人并未失望，簡單因為當時我們并未存着那一切的希望。我們理解：戰爭乃是世界和中國種種矛盾未能解決之後果，這些矛盾決不能由戰爭來解決的。所以戰爭雖然終止了，矛盾仍舊留存下來而且更加深刻。但願大家都明白，要過太平日子，要建國，要有真正的民主與和平，必須先拿中國的以及世界的社會矛盾加以根本解決而除了摧毀現存的腐朽制度之外，即除了徹底的革命之外，是沒有解決方法的。果能如此，這一年的苦難和失望就不是沒有代價的了。

陶行知先生突然地死了。在朋友們最需要他，敵人最仇恨他的時候，他死了。他的死，對於那些欲得而甘心的人是太得其時；對於我們，這些戰鬥中的同道者，却是太不得其時了。

然而，我們不想哭，不想過分的哀傷。對於人，如對於事一樣，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也是理解。我們要理解陶先生，以此來紀念陶先生。

我們覺得，行知先生首先是杜威博士在中國唯一的與真正的傳人。

有人會覺得我們這話小看了陶先生嗎？那末他應該明白，杜威博士可不是什麼渺小的人物呀。

自從中國和西洋文化接觸以來，西洋哲學家予中國思想界以極大影響的，除馬克思以下的一系列辯證唯物論者外，恐怕就要算杜威博士了。

這不是偶然的。在目前這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時代裏，有兩個主要的思潮對立着。一個是辯證的唯物論，另一個便是杜威一系的實驗主義。杜威的哲學不是唯物論的最高成就，但他是美利堅資本主義的，亦即目前唯一有力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現。當唯心論整個地回復到神祕與宗教的時候，杜威一系的唯心論，總算是比較最有生氣的，最能與辯證唯物論爭一日之長的。

中國被迫踏進這個現代世界的時候，那兩個對立的思想體系早就存在着了。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以及隨之而生惟在思想上覺醒略遲的無產階級，都只叫各自去接受這兩種思想好了。

五四運動，主要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

## 論中共的土地政策

鳳岡

最近有一個問題使許多人迷惘，就是中共對於土地政策是否已經有了改變。中共自己，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正式文告表示過改變，牠始終還是奉行着「減租保租，減息保息」的老政策，也就是說，牠始終堅持着農村的改良辦法，不實行土地革命。可是在事實上，我們知道蘇北在分田，在「清算」；在東北我們又聽得林彪對大公報的記者說，北滿一帶的土地「有變動，把過去日本人偽國固有及漢奸之土地分給了貧民。」（見七月七日大公報通信）

據我們猜想，中共的土地政策大概在「原贖上」沒有變，不過在實行上有些不同了。地主的土地確實在某些地方已經分給了貧苦農民，不過所根據的法律不是「土地沒收令」，而是「敵偽土地處置法」，或者是「過高田租清算法」，即地主土地之被沒收，不是因為他做漢奸，便是因為他歷年來向佃戶榨取了過多的田租，清算之後，不得不把田地都找給佃戶了。

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共在土地政策上的一個懦怯的與偷偷摸摸的轉變。這種轉變是不徹底的，不普遍的，因人而施的。這不是一個革命的處理，即不是作為要解決目前中國一個最迫切的任務使國家能以前進的必要行為，而是根據了刑法（懲治敵偽）或民法（償還欠租）的對某些個人實施的一種懲罰行為。這兩種行為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革命雖然也含有報復的意義，但這報復是階級的而非個人的，其主要的含義是被壓迫階級負起了歷史的使命，起來推翻那個阻礙歷史進步的統治階級及其制度，這裏如果包含怨恨或報復在內，那是完全服從着階級鬥爭與制度更迭的大前提的。一個革命，一個深刻廣博的社會革命，決不能因人而施，決不能對統治階級中的個人區分善惡因而施以賞罰的。如果事情還祇限於根據刑法或民法的懲罰行為，則牠離革命的距離還遠。不過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不是中共目前所行土地政策的性質，而是要問：為什麼中共不索性實行土地革命？同時，為什麼牠又在相當限度內放棄了原來的立場，偷偷摸摸地實行些土地「變動」？

要解釋這個疑問，可以從兩方面來說。第一，中共的土地政策的歷史的演變；第二，中共目前的地位對土地政策的影響。

### 歷史的回顧

按照列寧的學說，同時依照俄國革命經驗，乃至英法德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經驗，凡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與主要内容，就是要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要想把一個落後國家現代化，經濟上工業化，政治上徹底民主化，則最重要與最根本的一個條件，必須在農村中實行最堅決的土地革命，就是說，必須完全推翻地主階級，沒收其土地，分配給全體耕種的農民，同時，為使這個革命的成果不致落空，不致在高利貸等等的影響之下而重複集中於少數富農之手，應將所有權完全收歸國有，藉以保證農民生活的普遍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迅速增加。

祇有這樣的土地革命成功之後，才能有豐足的農村，因而有穩固的國內市場，因而能建設高度的工業

所以在初期，中國的思想界可說是杜威的天下。他本人被請到中國來了，他的著作給大批翻譯了，他的學說被普遍地傳播與應用了，他的門生多到不可計數了。

運動發展下去，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離開了杜威，轉到馬克思與列寧方面來；可是還有許多，尤其是『正統派』的學者，却仍舊信奉着杜威的主義，仍舊以杜威的學生自命。

陶行知先生便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之一；但雖如此，祇有陶先生，我們覺得是配得稱為上杜威傳人的。

這話怎麼講？為什麼在中國的許多杜威主義者中，祇有陶先生才配得稱杜威門生呢？

因為，杜威博士不但是個實驗主義的大師，而又是一個身體力行的教育家，民主主義者，具有一個崇高的人格。

說陶先生是中國唯一的杜威傳人，我們是就整個的杜威來說的。

就哲學講，杜威主義既然是行將死亡的資本主義的哲學，自然是反動的，論和社會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立於截然相反的敵對地位。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個鄭重的思想體系的完成了的與昇華了的代表者，往往（自然不一定）能具有崇高的品格的。在兩個制度交替時代，兩種對立的思想發生了接觸的時候，舊思想的最高代表者可能取幾種態度；或者絕對頑固，絕對排拒新的；或者徹底覺悟，完全轉變到新的；或者部分了解，容忍了新的。杜威的態度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而是有點近乎第三。他在思想上對辯證的唯物論根本不能調和，但對社會主義運動却不是深閉固拒，一味排斥的。他對被踐踏者具有廣大的同情，對蒙冤者表示着很大的正義。他有崇高的品格，有深厚的『人類愛』。

；同時有了酷愛民主與自由的獨立的衆多農民，才能真正談得到政治的民主化。所以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是土地革命。在西歐曾經如此，在俄國也曾經如此，在中國也是應該如此的。

可是中國共產黨，雖然她一開始就同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黨，同共產國際發生了關係，但是她的政策與政綱的規定，却不會受到正確的列寧主義的指導。為什麼呢？因為當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五年廣大發展的時，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早已不在列寧（他死了）手裏，而是在史大林手裏了。史大林對於革命的見解，却是與列寧的見解根本不同的。中國，史大林以首先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所以唯一的障礙是帝國主義。因之中國革命的唯一任務，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如何打倒呢？當時的第三個國際領導者說，必須由中國各階級：『進步的』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聯合在一起，結成多階級的聯盟。因為據史大林說，『帝國主義的壓迫將中國各個階級壓縮成一個整體了』。所以他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共黨，服從三民主義，以便使國民黨實現為『四個階級的聯盟』，藉以打倒帝國主義。

在這樣的主張與行動之下，中國共產黨當然不能實行土地革命了。輪雖然高喊什麼『工農政策』，在農村中組織農民協會，但其作用以其說是發動土地革命，毋寧說是控制那崛起了的農民的鬥爭。當時的共產黨員雖然也領導農民去反對土豪劣紳，但竭力制止沒收土地的『過火行為』，因為根據國際的見解，反對地主是破壞了反帝的聯合戰線，是催促『革命地主』，即催促國民革命軍中的大多數軍官們，到反革命方面去。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中，湖南廣東等地的農民曾經有過很大規模的鬥爭，不幸當時的共產黨服從着第三國際史大林一系的錯誤領導，幫助國民黨鎮壓了他們的『過火行為』，以致毀壞了自己的基礎，終於斷送了整個革命。

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又跟着共產國際史大林一系的領導，在土地政策上來了一個大轉變。他們在湖南，接着在江西，積極地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後來，為中國鄉村中土地分配之實際情形所逼（即大量土地集中在富農手裏），甚至還沒收過富農的土地。

這時期的中共政策，雖然也還是不正確的，因為她幻想靠貧農的力量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同時又和第一時期的政策相反，完全忽視了反帝鬥爭。不過，以數縣的基礎，羸劣的武器，一些革命的貧農和少數共產主義者竟能與挾全國資財且擁有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軍隊相抗達十年之久，最後且能突破重圍，長征數萬里，在另一個地區裏存續下來，則不能不歸功於當時徹底進行的土地革命的。

中共的江西時代在事實上告訴了我們，土地革命在中國鄉村中能發生多麼巨大的革命力量。那邊是在黑暗的反動時代，土地革命的區域又局限於江西一隅，但是牠的『輻射作用』却已遍及於全國了。由此可見，如果當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全國範圍內高漲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能够堅決地領導土地革命，使廣大貧農的土地鬥爭與城市工人及勞苦羣衆的革命聯絡起來，那將形成一個多麼大的力量！全部國民黨軍隊都會站到革命方面來，軍人資產階級與地主聯合舉行的南京叛變，以及武漢叛變，都將無法成功了。中共在江西時代的土地政策沒有錯，那時的錯誤在於牠完全退出了城市，完全放棄了反帝鬥爭，以及



還是寄出於藍的。

陶先生在本思想上，始終和他的老師一樣，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他未能更進一步地轉入社會主義。不過在最近一次談話中，我們曾聽他表示過對於『經濟民主主義』的看重。假使『天假以年』，讓他在實際鬥爭中多多生活，多多學習（陶先生的學習精神是老而彌篤的），那末，也許這位中國實驗主義中唯一可敬的人物，能够最後超過他的先生，拋棄那個資本主義的最後的思想體系，轉入辯證的唯物論，并由此爲社會主義，亦即較高的與較完備的民主主義而奮鬥的吧。可惜殘酷的政治鬥爭與不能克制的自然法則，剝奪了陶先生這樣一個進步機會了。

學習陶先生，痛悼陶先生，應該從陶先生未曾做到的地方做起，從『揚棄』他的杜威主義做起。

七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上有這個消息：『市政府專門編製生活費指數的專家蔡正雅先生已向市政府辭職，因爲當局對他計算物價指數的方法加以干涉。』

蔡正雅先生編製物價指數已有幾十年經驗了，他是在租界時代就在職工部局做這工作的。工部局時代，專家們能够忠實編製指數，因爲當時工人并未提出，即使提出也并未獲得；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要求。指數大小與資本家錢袋還沒有現在這般密切關係。

許多刊物（本刊在內）已經指出市政府公佈的生活費指數不可靠了。蔡正雅先生辭職，間接證明了科學專家畢竟不同於官僚，但重要的還在證明我們對於官定生活費指數的懷疑是有根據的。

地主的統治——國民黨之下，也仍舊得不到真正的民族獨立，甚至還得不到軍事勝利。八年抗戰，事實俱在，現在毋需我們對這一點多說什麼了。『勝利』是人家贈給我們的，民族獨立則比抗戰之前更不如了。爲什麼呢？這就要說到第二點了：上面說過，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地主是與帝國主義結不解緣的，牠不能獨立地反抗帝國主義，牠祇能多多少少地替帝國主義反對乙帝國主義，所以要眞能打擊侵略的帝國主義，工農大眾必須自己起來，要工農大眾起來，則必須讓牠們爲自己的階級利益而鬥爭。這鬥爭也許會暫時間招致軍事上的某些失利，但歸根結蒂，牠還是於抗戰有利的，因爲工農大眾對於壓迫者的革命烈火，乃是一個軍事力量上較差的國家能以擊敗較強國家的唯一武器，因爲強大侵略國的軍隊也是由工農組成的，而要瓦解這些軍隊，只有用革命行動來喚起他們的階級意識。近代一位最精湛的革命戰略家說得好：『如果中國大地給土地革命的火焰炙熱了，日本兵士就不能在這上面站住。』這是一句最深刻的話。

可惜中國共產黨（自然連同史大林的共產國際）完全不懂得這句話，在最需要土地革命的時候放棄了土地革命。北伐時代與江西時代的正反經驗被全盤忘記了，在『民族戰線』的欺人口號之下，有意無意地替國民黨盡着鎮壓工農鬥爭的醜惡工作。結果，教中國的老百姓白流了八年血，正不知爲誰辛苦爲誰忙！如今非但民族獨立談不到，而且共產黨自己也蒙了很大損失，一向來稱的工農代表資格也失去了，以致得不到全國最廣大的工農的熱烈擁護，以致無力代替那個反動徹骨的國民黨政府，終致國家陷入了政治談判與軍事混戰的全無出路的僵局中去。

### 怎樣辦？

這個僵局必須打開。反動的國民黨與美帝國主義方面，藉談判方法爭取了一年時間之後，現在似乎已經完成了軍略的佈置，正在從事大規模的內戰，企圖一舉而而去共產黨這個『盲腸』了。共產黨怎麼辦呢？就單純的軍事力量說，那是毋庸諱言，無論在配備員額或地位上說，現在都是處於劣勢的。如果不加入其他條件，國民黨要根本消滅共產黨固然是幻想，但共產黨要想不逐漸退縮至狹小區域，甚至想返擊而占得上風，則亦是絕不可能的。除非第三次大戰很快爆發，中共不會得到蘇聯的實際援助。那末中共將如何補救其軍事上的劣勢呢？當然只有在政治上擴大同盟者，在社會上加深其基礎了。目前中國由於國民黨一系金融官僚資產階級與大地主的對外無恥投露與內部的貪婪反動，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以及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轉入了反對派地位，在相當限度內同情了共產黨的改良政策，贊許了牠的廉潔政風，他們在政治上形成了民主同盟。共產黨當然要爭取這部分力量。另一方面，數量上要無比地多，質量上要無比地堅強，還有城市的工人階級與鄉村的貧農大眾。共產黨如果能取得這些人的完全信任，那末非但在政治上有辦法，而且在軍事上也能確保勝利。共產黨當然要這個力量，但問題在於如何爭取牠。工農，尤其是農民，是天生的經驗主義者，是頂頂實際的。空洞的諾言，休想喚起牠們的熱心。要牠們起來，首先你得解決牠們的問題，滿足牠們的要求，但要實際滿足工農的要求，主要的麻煩就來了：民主派資產階級和工農的利益是衝突的！顧此就要失彼，熊掌與魚是不能兼有的。

工人問題，對於中共，目前還不敢說，因爲中共在城市裏還沒有力量，牠的勞資合作政策還不會碰到實地試驗。

## 日本工人鬥爭的新形式——生產管理

記者按，這是郭溫源先生從日本寄來的通信，總名『動盪中的日本』之第三篇，即最後一篇。第一篇名『舊思想在崩潰中』，見本刊第四期；第二篇名『羣衆鬥爭的開展』，見本刊第五期。

上次的信很簡單的報告了戰後日本工人及一般民衆鬥爭開展的情形。但那裏，讀者大致還只能看出日本工人鬥爭在數量上的發展，並不能充分看出日本工人鬥爭在性質和方法上也比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我則要說這質的進步了。我要着重指出戰後日本工人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新的形式——生產管理。

所謂生產管理，就是工人們自己來管理生產。這一鬥爭方式，對於我們雖似乎覺得新奇，其實馬克斯在許多年以前早就明白指出，工人爲着制服資本家，爲着有效爭取勝利，自己動手來管理工廠，有時是必要的了。在各國工人鬥爭的歷史中，工人起來自行管理工廠的例子也並不是沒有。可是日本工人鬥爭中的生產管理有兩點是歷來各國工人鬥爭中找不着前例的。第一，生產管理已成爲工人在鬥爭中普遍採取的手段；第二，生產管理已超出工人鬥爭範圍而波及於一般公務人員，日本政府各機關中下級職員，爲着要求改善待遇而進行鬥爭的時候，也仿照工人的生產管理，自行管理公務，不受上級官吏指揮。

以上這兩個特點的政治意義是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強調得過分的。它實在表示日本工人和一般新給生活者的醒覺已達到很高程度，表示他們已經在接受馬列主義的最基本的認識：（一）工人要想徹

在鄉村裏這問題却十分迫切地提出來了：土地革命呢還是地主與農民的合作呢？換句話說，要不要把中共的軍事勢力和成千萬貧苦農民的命運打成一起？倘使問題祇限於鄉村方面，大概中共還容易選擇的即：發展土地革命，鞏固軍事力量。但事情很清楚，鄉村中的地主階級與中國城市中的民主派資產階級有着極其密切的血緣關係。中共一旦決定沒收地主土地，而且據江西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收土地就必然要觸及富農的土地（因爲不然的話，土地革命在有些地方會失去了對象的），那末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恐怕有好大一部分就要離開共產黨。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是十分害怕的。因爲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要發展中國資本主義，鞏固的政策是實行階級合作，誠心誠意地相信：中國不能實行反對資產階級的工農革命，尤其當抗戰以來的將近十年中，中國共產黨改信了三民主義，進行了民族的聯合戰線之後，牠本身的意識，構成及基礎方面，都蒙受了深厚的資產階級的影響與滲入，以致牠現在更加害怕在土地問題上和民主派資產階級衝突，將這些人嚇跑到國民黨方面去。

然而形勢萬分險惡，共產黨迫切地需要廣大農民羣衆的擁護。怎麼辦呢？這便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來：偷偷摸摸地，對人而施地，實行一些『土地改革』。原則上不實行土地革命，事實上有些地方沒收了土地；原則上討好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行動上相當示惠於某些貧農。這可說是一個兩面政策，表裏手法。

## 這轉變的前途如何？

我們現在不想批評這個轉變的本身，但想談一談牠能否收得牠所預期的效果，能否一方面爭取貧農的擁護，同時又不失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同情？

我們覺得，這個不三不四的辦法是會兩不討好的。在貧農方面，既然不是普遍地獲得土地，而更重要的，沒有一個新的土地制度，一種新的生活，一個新的前途開展在他們面前，他們會不熱心去接受所分配的土地，甚至不會認真看重這個辦法的。在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方面，則不管你用什麼理由，也不問你是強迫抑是『自願』，只叫沒收土地，觸動財產，總會使他們嚇得發抖的。對於中共的新辦法，民主同盟的某些領袖們已經在表示厭惡，在動搖了。事情發展下去，民盟上層的右傾是必然的。

中共處在這樣的境地，將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呢，還是更加退縮，以便拉住民主派的同情者？現在還看不出跡象。不過就中共歷年來的階級合作政策說，就他們發展資本主義的基本立場說，更進一步實行土地革命的可能恐怕小些，予土地變動以更多限制的可能恐怕大些。如果真是這樣，那末不僅對於中國革命的利益，就是對於中共本身，也是十分有害的。

我們認爲：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爲了農民大眾的生活，爲了迫切的飢荒，爲了中國工業的基礎，爲了中國革命利益的開展，同時，也爲了中國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軍政壓迫，土地革命必須徹底地實行出來。一切地主的土地，甚至好些富農的土地，必須無報償地加以沒收，移交給全體農民，即移交給農民的土地委員會，或貧農委員會。這種處理應該立即實行，等將來由普選產生的全權國民大會來加以核准。

這樣的沒收土地並不是依據於刑法或民法的懲罰行爲，而是完成中國一個迫切任務的革命行爲。所以鞭並非用以懲罰某些不良地主的。至於漢奸惡霸，則沒收土地不足以貸其罪，即使剝奪了他的土地也還須

底免除資本家的剝削，必須根本否認私有財產制度；（二）在階級社會裏，國家機構不外是統治階級用以抑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被壓迫階級要想徹底得着解放，必須看穿國家之階級的本質，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從工人鬥爭形式的歷史發展來說，最早的工人鬥爭往往隨伴着對生產工具的破壞，這雖也可以解釋為階級仇恨心理的表現，但更不可否認的也包含着錯誤的認識，以為工人的生活所以困苦，所以常常失業，不是由於社會制度，而是由於生產方法，但經驗給人們的教訓總是非常有效的。由於經驗的教訓，工人知道破壞生產工具對於自己並沒有絲毫好處，反會使自己因而失業。所以工人鬥爭到了後來已逐漸清算了這種盲目的舉動。但是不破壞生產手段與罷工如何能使資本家屈服呢？縱然資本家的政府承認工人有罷工權利，工人們能長久撐持罷工嗎？罷工給資本家的影響不過是使他們因生產停頓而沒有錢可賺，但是工人如果長期拿不到工資就要餓飯。所以工人不衝破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終是不能和資本家對敵的。於是在罷工之外，工人們為着爭取生存又發明了兩種方法，一種是怠工，一種是佔領工廠自行管理生產。前一方法是消極的，後一方法是積極的，再進一步就等於否認資本家的私有權了。

在戰後的中國，我們雖然也看見了工人鬥爭的高潮，但是拿中國的工人鬥爭和日本的工人鬥爭來比一比，很容易看出兩者之間有着性質的不同。中國工人鬥爭，直到目前為止，大致完全停留在經濟鬥爭的階段，並沒有明顯的政治要求。我們回過來看看日本工人的鬥爭，大致都是有計劃的有步驟的，隱隱中似乎有着一個總的目標，那就是削弱官僚資本家地主的統治，開闢建立自己政權的道路，工廠管理在某種程度，也可以說就是建立自己政權

加以革命的制裁的。

民主派會因此而離開嗎？可能的，甚至必然的，但這不過是少數吧了，少數上層的資產階級分子吧了。這些分子，早晚要離開的，那就讓他們離開得愈早愈好，至於大多數的下層民主派，那些城市中廣大的勞苦小資產階級，那些真正的民主派，無論在思想上或利益上，都會衷心歡迎土地革命的。他們不但不會因中共之實行此種革命而離開，反而會更加團結的。因為土地革命，即使是最徹底的，也只是一個民主主義的辦法，如果一個民主主義的戰士而反對最民主的土地革命，那他便是在假的，讓他早些去吧，早些拋開那只民主的假面具。

他們爭取民主派的最好方法是發展土地革命，而非停止土地革命。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明白這一點，覺悟到這一點。我們由衷地希望中共能够真正改變牠的土地政策，大膽而公開地揭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來。

八月三日

出版的某報在四月裏報道日本工人進行生產管理的時候就已列舉了工廠的種類和數目，合計起來，恰為二十八之數。如果美國報所說的工廠也就是日本厚生省所調查的那些工廠，則其鬥爭拖延之長，也就可想像了。又美國出版的某雜誌中有一段文章描寫日本工人自行管理生產的情形說：工人管理生產之後，把生產的東西自己拿去賣了來發放工資，工資大增，有的竟增加到百分之三百。

關於工人管理工廠情形，因為日本當局極力避免發表，所以我們也無從知其詳細，但間或也可以從報紙夾縫中窺知一二。本年六月初，日本厚生省發表勞資糾紛的統計，說表明勞資糾紛之採取生產管理方式者，自停戰至五月廿日間已有一百零三起之多。至於工人管理生產之久暫及是否徹底，我們雖未見日本官方有何發表，但根據各種材料推測，至少有一部分是相當持久的，六月十九日報載：

日政府對工人管理生產一事，已發表聲明，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理由，加以否認。因此對於厚生省所調查之廿八工廠之以生產管理為鬥爭手段自將加以禁止。

這裏所說的二十八個工廠雖不知道是什麼工廠，也不知道它們的生產管理起自何時，但是美國

是誰不願社會全體利益！

到這時候，資本家的政府當然不能再『社會全體利益』這個武器，於是又拿出『社會秩序』來。但是我們試想一想，工人們既未破壞生產，既未使社會陷於物資缺乏，在什麼地方破壞了『社會秩序』呢？揭穿了底子，當然就是侵犯了資本家的私權。可見資本家的政府所要擁護的並不是『社會全體利益』，也不是真正的『社會秩序』，實際上乃是資本家的私人利益。當資本家私有利益與社會一般利益相衝突的時候，政府總是站在資本家利益方面的。但它表面仍要掛着『爲全體人民』的招牌。

總之，工人的鬥爭愈激化，資本家政府的反動面目也就愈明顯。日本工人運動和一般人民鬥爭的高漲，不僅使日本統治階級又逐漸露出昔日的猙獰面目，甚至把要便日本『民主化』的美國佔領軍當局也嚇得板舵右轉。美國對於日本所採取的政策，最初當然是要盡量肅清封建殘餘，尤其是肅清法西斯勢力。但是一旦看到日本工人運動以燎原之勢向上發展，發展到工人鬥爭動輒採取自行管理生產方法，發展到幾萬幾十萬羣衆示威運動的接二連三舉行。於是麥帥總部在五月食糧節之後終於對日本羣衆發出警告：

余認爲必須警告日本人民羣衆在有組織之領導下所作暴行與肉體上之脅迫行爲，將大爲危及日本將來之發展。刻日本正由封建及軍國主義變爲民主國家。在此過程中，關於民主主義方法，已盡量准許，合理之自由，將來亦當准許，惟目前無紀律之諸分子開始實行之肉體上暴行，今後當不准繼續。……倘若輩不克自制，則余將不得已而講求必要措置。……以此警告爲轉捩點，日本當局之態度也顯然是改變了。日本政府當局的談論『民主化』，當然是

被動的，是迫不得已的。他們當然希望盡可能的維持舊有辦法，舊有統治，可是因爲處於戰敗國的地位，當然不好不聽美國代表麥帥的指揮。所以它始終小心翼翼地對於各種問題都在窺視麥帥的顏色。現在看見麥帥自己出面警告日本羣衆，他們的胆子當然又大起來。在這以前我們看到的是工會法的頒布（三月一日），對工人的組織工會給以頗大的自由，允許工人政黨的合法存在，談到勞工保護問題。但是從五月食糧節以後，日本政府給人民的是禁止生產管理，禁止大眾運動，進行強制仲裁，加強警察力量等等：

五月廿九日——日政府對於工人參加生產管理一事，以其足以紊亂現在之產業秩序，故認爲違法，並決計普遍予以禁止，惟不願出之以高壓手段，企圖設立經營協會，在行政指導之下，解決勞資糾紛。

五月三十日——日本政府依據麥帥總部對大眾運動之警告，已決定取締方針，又對於禁止工人參加生產管理，亦將發表聲明。……

六月十九日——日政府對工人管理生產一事，已發表聲明，以維持社會秩序爲理由，加以否認。因此對於厚生省所調查之廿八工廠之以生產管理爲鬥爭手段，自將加以禁止。禁止方法，據厚生省意見，先由當地長官加以勸告，再由企業主要求工人停止管理，如不聽從，再請勞動委員會屆中調停，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六月二十日——日內相昨雖發表否認工人管理生產之談話，以表明當局之決心，但生產管理之否認與實際取締則屬兩種問題。此刻對生產管理自身加以彈壓，實尚無根據（指法律根據），只有當鬥爭發生暴力行爲時，始能依刑

法規定取締之。因此日政府擬對包含生產管理在內之一切鬥爭手段設立新取締法，於最近可以決定具體方針。……

七月七日——日勞動關係調整法案已據勞務調整審議會五月卅一日之答覆要項作成草案。該草案對於勞動爭議之調整，計分三項辦法：

（一）斡旋，僅居間斡旋，求雙方自行解決。

（二）調停，調停委員會聽取雙方意見，提出辦法，勸雙方接受。（三）仲裁，由仲裁者提出辦法，強迫當事者服從。在調停中有所謂『強制調停』，將適用於公益事業，如運輸，郵政，電報，電話，自來水，電力，自來火，醫療，公共衛生事業等；該法案更有限制並禁止爭議行爲之規定，除對公益事業規定非在申請調停三十日後不得有爭議行爲外，並對教員，警察，消防隊，官吏等禁止一切爭議行爲。……

七月廿六日——日本警察制度之改革本亦列民主化要項之一，乃本日一面有社會黨議員大澤喜代一指猶特高警察依然暗中活躍，一面又有大村內相對警察首腦由人民公選一事答稱：鑑於輿論與情勢之推移，尚有充分檢討研究之餘地；此際則希望避免急驟之改革。

麥帥總部自從被日本羣衆運動嚇得倒退之後，不但對日本民衆發出口頭上的警告，不但默認日本政府接連採取一連串的反動步驟，不但放任日當局在議會對『國體』和『天皇』作令人欲嘔的詭辯，不再追求日本的『民主化』，甚至惟恐日本政府力弱不足以壓服民衆，於是自己挺身出馬，來直接干涉羣衆行動，七月十二日麥帥總部新聞招待記者聲明：

今後示威遊行等團體行動，須於四十八小時

前經由所轄警察局長呈報聯合軍憲兵司令部。

爲什麼麥帥要直接干涉日本民衆的行動呢？當然是因爲日本工人和一般民衆的反抗運動已經發展到讓日本政府難以單獨應付的程度。當麥帥在五月糧食節後對日本羣衆發出警告時候，靠着戰勝者的威嚴，雖一時把日本民衆嚇得楞了一下，但是爲生存的鬥爭是可以衝破一切危險，一切壓力的。日本工人及一般民衆不但向這些無理的壓迫，不當的措施，作口頭上的抗議，而且繼續用實際的鬥爭行動來回答抑壓者。當麥帥發警告的當日，民衆大會實行委員會即作了反駁麥帥的談話，稱：

吾人信麥帥聲明之真意並非針對吾人有組織有秩序之羣衆運動。在如此窮乏之日本，倘無吾人之有組織行動，日本全國必發生可怕之糧食暴動。……遏阻此危險之道，唯一即實行有秩序有組織之羣衆運動，即吾人之工會運動是也。……

辭句何等委婉！但是稍遲之後，日本羣衆又恢復了自信力，我們試看：

五月三十一日——日政府會經聲明取締勞方生產管理，共同鬥爭委員會代表……等昨分訪首相及商工相，提出反對取締生產管理之議決

我們要替誰說話？

東北問題之我見

從四國外長會議失敗說起

關於罷工權

工人運動的危機

兩種民主

論國民大會

振聲

尊一

蘭因

劉默

K遠

三T

唐盛

案，主張生產管理合法。

六月六日——日本三十九工會昨舉行反對彈壓生產管理共同鬥爭委員會，……一致通過打倒吉田內閣，並決定將議決案面交吉田，要求其辭職。

六月廿七日——東京電力公司自廿一日實行工人管理業務以來，至今已達一週。市政當局雖不承認工人管理業務，但東京勞動聯合會則加以支持，認爲合法，兩不相讓，進入持久狀態。……東京勞動聯合會於廿五日下午開常會後，向市議會議長，大村內相及各政黨提出陳情書，……昨且商定於二十九日對議會舉行反對彈壓業務管理示威。

六月三十日——東京公務員協會會員約九千名於廿一日起斷然實行公務管理，昨日上午於衆議院開會時，前往議會，舉行示威遊行，並推舉重森等二十人，分爲兩批，往見吉田首相及衆議院議長，面呈反對彈壓生產管理要求徹底改善待遇之議決案。

七月九日——與勞工有關之法案，已經六日之閉議修改，得有關於方面諒解後，即將於本週中提出議會。……社會共產兩黨表示全面反對

中國工人的工資比美國工人多麼？

怎樣解決內戰？

正視與理解

從第一國際到第五國際（常識）

『勝利！誰勝利？』

解決通貨膨脹的兩條道路

救濟原來也是武器

舒嚴

劉默

鳳岡

蘭因

舒嚴

三男

凱命

……認爭議爲工人基本權利……

七月十五日——日本鐵路東京地方工會等二十團體約一萬餘人，今日上午十時在宮城前舉行東京地方工人大會，反對日政府提出議會之勞動關係調整法，……議決：（一）絕對反對勞動關係調整法之成立，（二）絕對反對彈壓一切生產管理，（三）促進勞動保護法之制定，（四）撤廢甲種所得稅，（五）確立以生活費爲基準之最低工資。會後至首相官邸及議會前遊行示威。……

七月廿七日——全日本公務員公會昨就政府所擬勞動調整法協議結果，認爲該法案刺奪公務員之爭議權，事實蔑視公務員之生存權利，乃決定除警察局外，展開一大反對運動。定廿九日赴議會向全體議員分發反對宣言，並利用廣播……等向國民呼籲。八月二日動員全國公務員舉行示威運動，十二日起自行管理事務，不受上級指揮。

照這些情形看來，生產管理不但是工人鬥爭的有力的新武器，而且成了一切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連結樞紐，它的發展，實在是我們應當特別注視的。

有密約應該公開出來

休戰期滿後

論生活費指數

爲工人伸冤

從荷印華僑被屠殺說起

天主教會與世界政治

『腐蝕』（書評）

舒嚴

舒嚴

舒嚴

鎮遠

鳳岡

蘭因

李阿德

# 革命問題漫談(續完)

穆德

七

新旗 第六期 12

與我們同主張不斷革命論的人，有一派反對我們上面提出的革命觀，他們對於中國底不斷革命提出了一個與我們不同的公式。他們的代表人之一寫道：

『我們所稱現時中國革命之不斷性的意義，是着重於第一點，即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中之「轉變」的中心關鍵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這「專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結束，同時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是革命發展轉變的產物。』(見一本討論集「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第一頁)

這個公式，與毛澤東底公式，同樣把未來的中國革命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民主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所不同的在於毛澤東認為兩個階段中間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階級專政，而這個公式則視無產階級專政為兩階段間轉變之「中心關鍵」，前一階段到此結束，後一階段立即開始，罷了。我們反對毛澤東公式，不僅因為他設想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而且因為他把革命分做兩個階段；又不僅因為他把革命分做兩個階段而已，而且因為他堅持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任務必須截然分開，不能合併着完成。

照不斷革命論說，在革命過程中，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任務是不能依照時間先後分別完成的，這兩種任務都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合併着完成。

照不斷革命論說，整個革命過程是不能劃分為兩個不同階段，彷彿民主革命能於第一階段結束，而社會主義革命能於第二階段開端的。事實上是民主革命遠未結束以前，社會主義革命早就開端了，而社會主義革命開端了以後好久，民主革命才能結束。

照不斷革命論說，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並沒有甚麼「轉變的中心關鍵」，尤其不能拿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這個「關鍵」，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并不能結束民主革命，革命中的民主任務反而須待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好久才能完成。

我們仍舊徵引俄國大革命事實來說明罷。俄國民主革命是在十月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時候結束的麼？不是的，那時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正在開始解決哩。十月革命之後至少有半年長久，無產階級政權還在解決民主任務。俄國民主革

命結束時也並沒有甚麼「兩個革命中間量變質的特殊現象，即大爆發的關鍵」(見同書第五頁)。俄國民主任務是在社會主義過程中順帶地完成的，完成得如此平凡以致沒有甚麼大爆發意義的變質的特殊現象。

由此可見，上面徵引的那個公式，雖自命為不斷革命論的，實與不斷革命論沒有共同之點，不過是毛澤東公式底一個變種罷了。

那個公式爲了堅持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任務不能合併着完成，須分爲二個截然不同階段來完成原故，所以拚命攻擊「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即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觀念。他認爲革命第一階段，即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前的階段，祇能提出民主任務，絕對不能提出社會主義任務。他說：『社會主義的任務的口號提出議事日程，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或許是第二日)。』(見另一本討論集，「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第十一頁)他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社會主義任務。革命一開始既然必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取政權要求，那麼這革命自始就含有社會主義性質了。他又不知道，中國革命在其第一階段就須動搖資本主義的私產制度；鄉村，不僅要提出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口號，而且要提出沒收富農土地歸貧農口號；城市，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工人管理生產問題也會很快提到我們面前來的。凡是反對革命一開始即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人，必不可避免地要反對一切能動搖資本主義私產制度的口號和要求的，必不可避免地要放鬆奪取政權的努力的，因之亦即不可避免的要葬送革命自身的。

那個公式爲了同樣原故，又拚命攻擊「中國民主任務祇能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完成」的觀念。他認爲民主任務必須同社會主義任務分別開來，單獨完成。他不知道，這兩種任務是互相糾纏，互相錯綜，不可分別完成的。總之，在無產階級未會建立其專政以前，民主任務是莫想完成的，而民主任務依賴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亦即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順帶完成之意。

我們主張不斷革命論的人，必然也認爲：(一)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即含有社會主義性質，(二)中國民主任務祇能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完成，(三)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互相糾纏，不可分離的。反之，凡斷言：(一)中國革命初期決無社會主義性質，(二)民主任務決不能順帶完成，(三)社會主義革命，須待民主革命結束之後，才能開端(這中間無論是否以無產階級專政取政權爲「轉變關鍵」)的人，無論自稱甚麼都可以，但決不可自稱爲「不斷革命論者」，因爲他們堅持的三點正是不斷革命論所要反對的呀。

惟有我們確定中國革命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性質，而且一開始就屬於這個性質。

根本反對我們的革命觀的人要反問道：你們以為中國已經成熟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了麼？

僅僅就中國一國來說，無疑，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是尚未成熟的。但我們與其他黨派不同的，是我們并非從中國一國觀點來看中國革命，而是從世界觀點來看中國革命。就世界整個來說，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早已成熟了。一九一七年時，列甯對於俄國革命也是這般看法。列甯堅決斷定俄國革命屬於社會主義性質，難道那時俄國已經成熟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了麼？沒有！那時俄國民主革命尚未會完成哩。但俄國一國雖然尚未成熟社會主義革命條件，却已成熟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機轉時已經造成了如此條件，非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便不能完成其民主任務了。革命機轉發展下來既然非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可，那麼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無論你願意不願意，也非積極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去不可了。至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否成功，以及成功到甚麼程度，則不是俄國一國所能決定的，必須由世界來決定，至少由多數先進國來決定。俄國如此，中國亦然。我們所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不過表示中國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及必須沿着社會主義革命道路走去之意，并非表示中國一國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之意。惟有世界革命才能完成社會主義。

并不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觀但堅持革命第一階段不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人，也要反問道：你們以為中國民主任務已經完成了麼？或者這種任務在未來革命鬥爭之中不佔重要位置麼？

## 中國革命悲劇（續）

在同一大會通過的一個補充文件中，這些觀念說得更加具體：

『在附屬國中，有兩種不同的運動，一天比一天相隔更遠。其一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運動，以資產階級制度下的政治獨立為綱領；其他是貧苦而無智識的農民和工人從一切剝削制下求解放的羣衆行動。前者圖謀統制後者，在某種限度之下這圖謀也常常成功；但共產黨際以及當事的黨必須鬥爭反對這種統制，又須幫助殖民地勞動羣衆發展其階級覺悟。爲了推翻外國資本家（這是走向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革命分子底合作是用的。但是最重要的最必需的任務是成立共產黨，由共產黨去組織工人和農民，領導

來革命鬥爭之中不佔重要位置麼？

不，中國民主任務是尚未完成的，這種任務在未來革命鬥爭之中還要佔重要位置的。我們說革命一開始即含有社會主義性質，這話并不帶有無視或輕視民主任務之意。這話不過強調：中國革命中的民主運動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有力量，民主任務必須至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才能完成，而革命一開始也不能避免提出若干超出民主範圍以外而能動搖私產制度的要求。反之，凡堅持革命第一階段不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人，則往往要反對在這階段提出那些超出民主範圍以外而能動搖私產制度的要求。他們認爲必須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或許是第二日』）才能提出那些要求。可是，革命在鄉村若不爲貧農利益去反對富農，在城市若不要求工人監督或管理生產，則中國能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之能否完成民主任務，也是很可疑的。堅持革命第一階段不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人，從好處說不過告訴人以中國民主任務尚未完成而民主運動對於革命又很重要罷了，從壞處說則有輕忽了民主運動應由工人領導及超出民主範圍以外的口號和要求應及時提出之危險。可是現在中國廣大羣衆期待於革命黨底重要了，已經廣泛地開始爲民主要求而鬥爭了。現在羣衆所缺少的，正是人們告訴他們如何能獲取民主運動底勝利，如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和若干社會主義要求去完成民主任務。羣衆所缺少的，正是無產階級在民主運動中的領導權，正是社會主義的前途。惟有將中國革命定爲社會主義性質而且一開始就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才能給予羣衆這個指示。（完）

Harold R. Isaac 著  
唐 威 譯

他們去革命，去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如此，落後國羣衆在資本主義前進國覺悟的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就可以不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而到達共產主義了。

『殖民地解放運動底真實力量再不限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主義者狹隘範圍內了。在大多數殖民地裏，已經存在有組織的革命黨，努力與勞動羣衆發生密切的聯繫。（共產國際與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關係，應當經過這些革命組織媒介來實現，因爲這些組織乃是各該國勞動階級底先鋒隊。）他們現在人數雖不很多，但反映了羣衆底企望，羣衆將跟隨他們走向革命去。各帝國主義國家底共產黨，必須與殖民地這些無產階級黨聯合而工作，經過他們給予一般革命

運動以一切精神的和物質的贊助。……

『殖民地革命，在其第一階段不是共產主義革命。但若一開始領導權操持在共產主義先鋒隊手裏，則革命的羣衆就不會走入歧途，而能向前直進，經過革命經驗發展上諸連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殖民地革命必須按照一種綱領去進行，這種綱領含有好多小資產階級改良條款，如平分土地之類，但不可由此做出結論說：革命領導權必須交付於資產階級民主派。恰恰相反，無產階級是必須有系統地有力地宣傳蘇維埃觀念，而且有可能時儘速組織農民和工人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與資本主義前進國的蘇維埃共和國合作，爲了最後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

共產國際用這幾段話便綜括了半世紀來革命思想和經驗之果實，而應用之於東方問題，——尤其是俄國革命底經驗，以及由此經驗發現出來的落後國家在二十世紀條件下資產階級革命之內部動態。

對於中國，俄國幾次革命底教訓更加重要。這兩個國家底命運首先是即將近六千英里的共同邊界聯繫起來的。兩個由相異的人種和民族構成的國家，又具有相異的文化和特性，并不互相衝突，反而越過土耳其斯坦和蒙古邊界而漸漸地混合起來。在兩國，農業人口都佔據多數，無產階級都佔據雖小而有決定性的少數。同帝制時代的俄國一般，第一次大戰後的中國也是落後的國家，配合着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和過去封建制度殘餘，——這種反常的配合物顯示了廣大農民羣衆底破產和貧困。在俄國，專制主義束縛了國家生產力，延長了過去野蠻狀態；在中國，則帝國主義以更強暴的方式癱瘓了國家底經濟生長。經濟的和社會的落後性使得兩國羣衆長久處於奴隸地位。而最黑暗的迷信，無知，以及幾千年傳統底重壓又支持着這種奴隸地位。新興的俄國無產階級，在戰爭造成的環境之中，證明了惟有他能解放國家創造潛能去自由發揮，能開闢了天產工業化道路，然後靠其他國家工人援助又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於全世界基礎之上。

中國不僅與俄國一般落後，而且比俄國更加落後些，因爲中國進入世界歷史主流更遲得多，又因爲帝國主義比較羅曼諾夫腐朽的帝制更有力量阻礙中國發展道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發生於落後的國家進而爲帝國主義國家時候，這次革命把國內階級分野劃得清楚了，牠也是一個世界歷史因素，促成了中國一九一一年革命之爆發，以此推翻清朝最後一個皇帝底皇位。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已能給予工人階級最前進部分以其歷史使命的意識了；在中國，則經濟機構底改造和新階級分化底形成，一九一一年時尚未發展至於能够從政治

權力方面表示出來。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壓制，當時力量太薄弱，不能造成自己的近代化的統一國家來代替滿族政治。無產階級則尚在誕生之中。所以政權落入於那些軍閥手中，他們各地方的統治不過掩蓋着帝國主義者之間矛盾對立罷了。雖然如此，一九一一年革命仍開啓了一個過渡時代，這時代再不能過去那樣引到新的皇朝去，而是引到國家經濟階級基礎及其政治藥物之完全改革去。大戰幾年間，中國生產力底迅速發展遂造成了一個近代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壓制底暫時鬆懈，讓中國資產階級中某些成分敢於夢想一個能自由發展的生產力，一種前所未聞的利潤。然而他們這個夢想畢竟受於帝國主義者底競爭及其相互間的敵對而不能實現了。外國資本榨取了過多的利潤，以報償牠在採辦原料和製造商品時所投放的資本。此外，中國資產階級若不解決土地問題，就無法擴大國內市場；而牠若不改變現行的全部財產制度，也就無法解決土地問題。

俄國革命貢獻了一個新而澈底的出發點。俄國的布爾雪維克派依靠世界革命爲唯一的條件來保障其勝利，而世界革命是要合理改造世界經濟和按照人民需要合理分配世界生產品的。這就是說，要廢除資本主義下世界市場之無政府狀態。在這新制度之下，諸前進國既然相衷合作以提高各國人民底經濟和政治的水平，則必能給中國以有計劃有系統的援助。這就是中國真正完成其民族解放之唯一意義。要達到這個解放，必須動員全國廣大羣衆起來爲反對本國的和外國的剝削而鬥爭。做帝國主義附庸的資產階級是不能領導這種鬥爭的。新興的無產階級，還沒有經驗，已經必須負起使命，領導全國廣大羣衆走入未來去了。沒有其他的階級能負擔這個領導使命。

無產階級在中國社會中的政治作用，受決定於牠的生產地位多些，受決定於牠的人數百分比少些。問題并不在於中國是否『成熟了』社會主義；當初俄國問題也是這樣。問題乃在於整個世界是否『成熟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人數對於全國人口比例問題，比較小些；無產階級在全國各階級對立中所佔經濟和政治地位問題，則比較大些。下面的數目字比較來看，仍是很有趣的，即一九〇五年俄國工廠工人有一百五十萬人，城市和鄉村工人則被估計爲一千萬一千五百萬人。含有工廠工人在內的產業工人，據一九二七年估計，約有二百七十五萬人，手工業工人則超過一千一百萬人。即使把兩國人口總數及人口分配和密度對照來說，以上的數字也是很相近的。兩國工人鬥爭精神和品質也很相近。中國工人剛於大戰期中形成了階級，第一個近代意義的工會亦才出現於一

九一八年，可是一年之後中國工人階級就罷工援助愛國學生之反對日本搶奪山東和凡爾賽條約出賣中國利益，以此去干預國家政治生活了。又六年之後，就有一百萬工人參加了罷工，其中好多次直接提出了政治要求。又二年之後，中國工會已有將近三百萬會員，而上海工人能實行一次勝利的暴動，奪得政權了。如此空前的長成速度，一方面固然是中國工人階級弱點底一種根源，他方面也是他的年輕有力之一種表現。這裏，簡單的類比就必須停止了，而應當拿歷史的連續性標準來判斷。中國工人階級力量之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就是俄國無產階級業已勝利而且業已統治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這個事實。

中國工人即使比當初俄國工人更弱些，因為更年輕些，但也比當初俄國工人更強得多，因為現在有了這個工人國家存在，為世界範圍階級鬥爭中一件巨大的客觀因素。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影響，不僅表現為輻射出來的無形的推動力，不僅表現為他的極重要的歷史教訓。他是形存在着。新加入鬥爭的中國工人明顯看見他的背後屹立着俄國無產階級，俄國工人國家，以及一切先進國工人中最先進的部分，他們團結為共產國際。這個世界因素，比較任何其他因素更有力量，催促了中國工人勇敢担負起領導四萬萬人口的民族之責任。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橫生了一種歷史的矛盾，轉變這個決然有利的因素為其反對面，轉變中國革命底最大的資產為其最重要的債務。

當中國革命新力量開始集合時候，歐洲革命浪潮已經低降了。俄國蘇維埃國家，無論從內的方面或外的方面看，都要求休息。他從帝制時代繼承下來的經濟機構已經為戰爭所摧毀，為「戰時共產主義」需要所耗竭，至於極限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得不後退到新經濟政策去，讓精疲力竭的民眾能够喘喘氣。這種戰略上的撤退，首先是為了歐洲諸先進國工人階級未曾如人們所期起的來援助俄國革命。第二國際屬下的社會民主黨，本是歐洲各國工人運動領導者，可是當大戰爆發來試驗他們時，他們就從口頭上的國際主義者墮落為事實上民族主義者了。他們各自領導工人去保衛資產階級祖國。在戰後混亂的時期中，他們表現出了是資產階級制度之有力的支撐者。他們阻擋了無產階級革命潮而把政權完整地送還給資產階級。沒有一個堅決的徹底的革命的領導，列甯和布爾雪維克派所期待的歐洲革命，遂不能勝利了。蘇維埃俄羅斯面對着的，不是歐洲工人國家底援助，而是帝國主義干涉底刺刀。蘇維埃俄羅斯擊退了敵人底進攻，但終於被迫與周圍諸懷敵意的資本主義國家商訂暫時的停戰協定。列甯百次千番說過：在落後俄國的工人國家，若無若干先進國工人來援助，是不能支持的。當他被迫帶領當政的無產階級後退至新經濟政策去時，他明

顯認識敵階級勢力有拾起頭來從內外危害無產階級專政之危險，因為歐洲革命浪潮以及俄國羣衆底緊張情緒開始衰退了。布爾雪維克黨人希望，經過共產國際和蘇維埃國家積極的活動，世界能發生一批新的事變，使他們得以迅速轉移勢力對比，使之有利於無產階級。共產國際前四次大會給予了各國的黨以思想上的武裝，在將來新的事變之中這些黨定能發揮巨大作用的。可是無論列甯或托洛茨基底天才都無法定製歷史。在國家孤立和羣衆退潮條件底下，尤其經過國內戰爭以後，官僚主義反動漸漸執掌了新國家機構，——這反動反映了國內外敵階級底壓力。在歐洲新興的革命組織尚未能重新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以前，蘇維埃官僚層圖謀鞏固自己的陣地。

這個官僚層開始在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外皮鞏固起來，他以俄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孤立為其出發點。他開始將蘇維埃政策從世界革命前提轉移到官僚層自己的狹窄的保守的一國的利益去，以為官僚底利益就是工人國家底利益。列甯晚年會打擊這個傾向，但他強過於他。不久，列甯就停止其鬥爭了，而政權遂落於新官僚層底代表人約瑟夫·史大林之手。布爾雪維克反對派以托洛茨基和黨內無產階級核心最好的分子為中心團結起來，反對那些篡竊者。反對派逆流前進，但并不能阻擋或轉移這個潮流。新領導者口頭上還是主張發展世界革命，但實際上已開始拿鞏固官僚特權來代替世界革命了。歐洲革命底失敗，尤其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底失敗和這些情緒遂產生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史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提出來的。他以此代替了列甯底革命的國際主義，以此為後來修正了的「布爾雪維克主義」之中心理論。

這種民族主義的墮落，本是在蘇維埃國家孤立地位之腐蝕性的影響之下進行的，他不可避免地要走到這個地步，即蘇維埃內政和外交都要離開了無產階級的基礎。內政方面，人們一定要去求悅於小資產階級，富農以及新經濟政策利益附屬於蘇維埃官僚層外交要求之下。人們再不起起甚麼「作最大的民族犧牲為推翻國際資本主義」了，人們做的是最大的國際犧牲為了保持俄國一國的「社會主義」。這種轉變進行了十年以上時間，而且經過好多次使人迷糊的左右搖擺，最後才完全支配了西方各國共產黨。但東方諸國更早就受了它的影響，因為那裏人們一方面急欲獲得強大的資產階級同盟者，他方面失去了對於工人階級政權的信任心，遂至實行那些政策，——這些政策并非出自布爾雪維克主義和十月革命的，而是出自門雪維克主義，堅持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

中的領導權，主張工人利益應從於資產階級利益。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嚴格依照時間劃分『階段』，——這個迂腐而機械的觀念遂代替了十月革命底活經驗，這經驗顯示了那些階段是如何互相錯綜融合的。

史大林及所謂『老布爾雪維克派』的許多上層人物如此容易走上這條道路，——決不是偶然的事情。一九一七年四月列甯未曾回到俄國以前，他們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例外，都主張不可侵犯革命初期成立的資產階級政權。史大林就是那個有名的公式『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之提議人，列甯一回到國就反對這個公式，不惜為此與當時黨領導人物決裂。史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黨會議上宣言：『臨時政府，在其鞏固革命步驟的限度內，我們必須支持他；但在其是反革命的限度內，則支持臨時政府是不可容許的。』（見一九一七年三月黨會議記錄）幾日之後，列甯在其有歷史意義的『四月提綱』中，打擊這公式道：『決不支持臨時政府。暴露他的一切諾言底欺騙作用。……揭破而非容忍那散佈幻想的要求，彷彿這個政府，一個資本家政府，能停止其為帝國主義的。……』（在以後開始的一次黨會議上列甯宣言：『連我們布爾雪維克派也表示信任政府哩。這是社會主義底死亡。你們，同志們，既然信任了政府，那麼我們的道路就分開了。我甯願處於少數地位。』當他要求黨採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路線，并宣布『民主專政』舊觀念祇合放入『革命前』布爾雪維克『古物陳列館』去時候，那些嚇壞了的『老布爾雪維克派』，連史大林在內，則罵他『跳過了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列甯提出的路線勝利了，十月革命跳過那些『資產階級民主階段』保衛者頭上了。可是到了革命浪潮後退而留下政權在這些保衛者手裏時候，我們又看見他們仍舊抓緊那些『革命前古物』。十月經驗過去，沒有留下甚麼痕跡在他們的頭腦裏。那些『古物』被人拿出來擦亮，而且蓋上『布爾雪維克主義』和『十月革命』印記，爲了助長新統治層底威權。當革命開始震撼中國，而蘇維埃官僚轉移其注意力於東方時候，列甯和托洛次基底動態的布爾雪維克主義遂讓位於布哈林煩瑣公式所修飾的史大林經驗主義了。構成他們的政策之根本動機的，并非中國無產階級底利益，而是官僚要在中國尋求一個有力的民族資產階級同盟者的願望。門雪維克派馬丁諾夫和辣夫斯出來『解釋』應當怎樣應用布爾雪維克主義於東方諸國。他們的中軸并非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

中國工人已經自發地走上革命道路了。工人從城市輻射出來的推動力已經開始刺激鄉村農民起來行動了。爲擴張希望所鼓舞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操縱這個新興的運動了；資產階級，如列甯所預見的，已經圖謀利用共產主義和十月

革命威權了。他方面，中國卑微的苦力，以其特長的英勇，犧牲和堅韌，已經開始反對那種社會，她始終把他們當作絨氈而柔順的牲畜。苦力要補救他們政治成熟之缺陷，就需要工人國家援助，首先需要一個革命黨，她有十月革命思想武裝，有共產國際力量贊助，又深深認識她的歷史使命。具有了這些力量之後，中國革命就有千載難逢的機會，來給予帝國主義以一個致命的打擊，來激動整個被壓迫的東方，摧毀帝國主義權力基礎，以此解除蘇維埃國家底孤立地位了。

短短的迅速的幾年中間，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從中國諸城市底街道和諸鄉村的農田興起來。要摧毀或改變中國社會中一切陳舊的，腐敗的，臭朽的東西。但是領導這個運動的人，並沒有教育羣衆打破那上下服從的舊傳統，反而仍把羣衆拴縛在他們的剝削者底政治子背後。共產國際和十月革命底整個重量和威權，不是拿來支持無產階級爲一種獨立的力量，而是拿來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結果，羣衆到了鬥爭高潮被阻止前進了，他們的組織被粉碎了，他們的領袖被殺頭了。他們搖撼了的那個剝削制度，又穩固下來了，而且一直穩固至今。這就是中國革命底悲劇。（第二章完）

第四期要目

- 『六二三』的教訓……………振聲
- 非資律果真獨立了麼？……………蘭因
- 應有的聲明……………三男
- 工人與政治……………舒嚴
- 一個老口號的復活……………鳳岡
- 工人與農民（讀者通信）……………羅光勳

第五期要目

- 關於政治暗殺……………振聲
- 解決失業與合作工廠……………鎮遠
- 女工們應有的自覺……………雲弟
- 菲律賓底國內戰爭……………蘭因
- 國大問題的癥結何在？……………三男
- 第三國際解散後的各國共產黨……………因
- 竊國大盜袁世凱（書評）……………舒嚴

長篇

連載

- 革命問題漫談（從一期至六期）
- 動盪中的日本（從四期至六期）
- 中國革命悲劇（從一期起）